

语言接触研究综述：兼论多语接触研究的新趋势

赵义平^{1,2}

¹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²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云南 临沧

收稿日期：2026年3月20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20日；发布日期：2026年5月29日

摘要

语言接触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作为独立学科兴起以来，始终是全球语言学界的前沿课题。中国得天独厚的多民族、多方言环境为该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田野资源，驱动了研究的蓬勃发展。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语言接触研究的演进历程，重点评述了西北、西南多民族聚居区以及南方各大方言区在语言接触中的语音、词汇及语法变异研究。现有成果多集中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及人类学等跨学科视角，但在三语及多语接触、语义与语用平面的深度互动分析，以及本土化理论框架的构建方面仍存提升空间。本文旨在总结既有研究范式，并对未来语言接触研究的精细化与理论化趋势进行展望。

关键词

语言接触，研究综述，事实描写，机制解释，本土化理论

A Review of Language Contact Research: With a Discussion on New Trends in Multilingual Contact Studies

Yiping Zhao^{1,2}

¹School of Humaniti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²School of Humanities, West Yunnan University, Lincang Yunnan

Received: March 20, 2026; accepted: May 20, 2026; published: May 29, 2026

Abstract

Research on language contact has remained a frontier topic in global linguistics since its emergence

文章引用：赵义平. 语言接触研究综述：兼论多语接触研究的新趋势[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5): 1057-1066.

DOI: 10.12677/ml.2026.145490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1940s. China's unique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a vast array of ethnic groups and dialects, has provided abundant field resources, driving the robust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domestic language contact research, with a focus on studies concerning phonetic,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variations in the multi-ethnic regions of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China, as well as major dialect areas in the South. Existing achievements primarily adopt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such as sociolinguistics, psycho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 However, there remains significant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in-depth interaction analysis of semantic and pragmatic levels within tr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contact, as well a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ize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is paper aims to summarize established research paradigms and offer prospects for the trends of refinement and theorization in future language contact studies.

Keywords

Language Contact, Research Review, Factual Description, Mechanism Explanation, Localization Theo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是孤立存在的。有人类的地方就有接触，必然也有语言的接触。著名语言学家罗仁地近期在他的文章中说到，他所研究的是人类的行为和认知，语言就是一种行为，“我们需要从交际互动的格式塔(完形)以及影响交际互动发生和运作的因素进行研究。” [1]而语言接触现象则更明显地体现这种交际互动，也带有显著的交叉性学科性质。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受到接触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还关涉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遗传学、考古学等学科。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语言接触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到目前为止，仍然方兴未艾。纵观国内外研究历程，中国语言接触研究正经历从早期对接触现象的“事实描写”向深层演变机制的“机制解释”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的精密化，更体现在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理论框架”的自觉构建。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指“使用两种或多种不同语言或变体的个人或群体，在直接或间接接触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语言使用现象及其结果所产生的各种变化情况。” [2]语言接触得以实现在于个人或群体的接触，语言接触不仅包括不同语言间的接触，还包括同一语言不同变体之间的接触，语言接触所产生的结果是多样化的，并且与各种社会因素有明显关系。

2. 国外语言接触研究的理论源流

关于语言接触的关注和研究，国外起步较早，Sapir 和 Bloomfield 分别在《语言论》中就已经关注到“语言间借贷”的问题。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由 Werner Leccpold, Einar Haugen, Uriel Weinreich 和 William F. Mackey 四位学者在典型的移民国家——美国慢慢建立起双语研究和语言接触研究学科。这四位也是该学科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者。

Weinreich 与 Haugen 开创了社会心理与生态视角的先河。Weinreich 的《语言的接触：已发现的与待解决的问题》(Language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 (1954)是研究语言接触和双语研究的经典之作，

是她影响最深远的著作，对语言接触研究有深刻的论述，当中还提出了语言研究从心理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的视角。“语言接触”第一次从她开始并被广泛地关注和研究，也成为随后几十年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关注点之一。Haugen 在《美国的挪威语：双语行为研究》(The Norwegian Language in America: A Study in Bilingual Behavior) (1953) 主要研究了双语现象，并提出了语言生态学的概念。在其论著中强调双语机制在语言接触和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双语者的社会活动背景对语言借用造成的影响，使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成为语言研究的重要辅助手段，学界深受其影响。

Thomason & Kaufman (1988) 提出的借用(Borrowing)与干扰(Interference)二分法，为解释接触机制提供了元理论。Thomason, S G and Kaufman, T (1988) 的 Language Contact 一书全面、综合地分析了语言接触的问题。包括语言接触的背景和稳定性、双语现象、语言接触的结果、区域语言、语言接触的机制、语言混合、语言死亡等内容，被高频引用，影响范围较广。

Labov 的变异理论为观察共时接触引发的历时演变提供了量化可能。拉波夫(William Labov)是“语言变异理论”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四项著名的调查：马萨葡萄园岛调查、纽约市调查、移民英语土语研究和费城调查，“把语言变化研究和语言变异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解决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的矛盾，理清了语言变异和语言变化的关系，为描述和解释语言的变化和起因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就此而言，该理论比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都前进了一大步。” [3]

3. 国内语言接触研究：从描写到解释

国内最早涉及社会语言学及语言接触研究的张世禄先生的《语言学原理》(1931)和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外语言接触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语言接触的基础理论形成，1959《中国语文》对此做了专题讨论，国内语言学家戚雨村、周有光等，就语词借用、语言融合、语言溶合、语言混合、外来词的概念和分在，引起国内语言学界对语言接触这一理论的广泛关注。学者们较早注意语言接触现象的是民族语言，全国开展的民族语言调查就已经很重视语言的相互影响，并把语言相互影响的各种实例记录在调查报告中。1984年喻世长发表了《应该重视语言相互影响的研究》一文，此文章深入探讨了语言相互影响的性质、范围及研究方法，并让人们开始认识到研究的重要性。在严学窘的《中国对比语言学浅说》(1985)一文中提出了“多语”的概念，认为“双语现象就是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使用两种语言，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则叫多语现象”，提出关注多语言接触研究。1992年戴庆厦发表了《语言关系与语言工作》，随后同年出版了《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此后，马学良、戴庆厦、李锦芳、徐思益、陈保亚、吴福祥、陈忠敏、张兴权、汪锋等在语言接触研究中不断探索、提出新的理论，国内语言接触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

3.1. 民族地区区域性接触研究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长久以来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格局为语言接触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天然语料库。回顾国内研究历程，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条从早期零星的感性描述，到大规模田野调查的事实记录，再到深层演变规律探讨的发展脉络。以下将重点从区域性接触(西北、西南)、方言间接触以及汉外接触三个维度，梳理国内学者如何在尊重语言事实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从“现象梳理”向“机制解释”的学术转型。

3.1.1. 西北甘青地区语言接触研究

西北地区有着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多民族聚居的人文社会环境，包括系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十多种语言。“包括：1) 河湟汉语方言；2) 安多藏语；3) 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语、东乡语、保安语、土族语、东部裕固语；4)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撒拉语。” [4]学者们主要关注民族

语和汉语接触之下词汇借用,汉语和民族语接触下语法变异、语法复制研究。代表杨永龙、徐丹、敏春芳、意西微萨·阿错、赵绿源等。

《当代语言学》2022年第6期专题讨论“甘青地区的语言接触问题”,刊登了9篇文章,其中6篇是探究语言语法区域特征,如:徐丹的《动词“有”的某些用法在北方汉语里的历时演变》考察了西北汉语中几种不同的“有字句”,认为都是来自民族语,领有者加与格标记就是一个证据。她进而指出,语言接触和借用为规律性的网状传播,而非线性直传的形式。王双成《西宁方言“说”“说着”的语法化》论述西宁及周边方言“说、说着”的使用特点及语法化路径是自身演变(内部因素)和语言接触(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有3篇涉及接触底层的研究,如:意西微萨·阿错《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基本特征与新证据》讨论了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13个基本特点语法标记,涵盖了从体词的性、数、格到动词的时、体、式、情态和构词形态等诸多方面。提出藏缅语与阿尔泰语之间在语法系统上,有着大量形态学上相当严格的历史语音对应,表现出深厚的历史关系,大有研究的空间。吴福祥(2021)讨论甘青方言中若干附置词所具有的“伴随-工具(-方所)”的多功能模式,并非这些方言自身独立演变的结果,而是源自阿尔泰语言相同多功能模式的区域扩散。此外,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外国学者曹茜蕾,主要从语言类型学(跨语言视角)的角度对该地的汉语方言有一定的研究,如:甘沟话、唐汪话等。

该区域研究已由单纯的词汇借用记录转向对“语法复制”和“型变”的系统解释。如徐丹对“有”字句的考察,证明了接触引发的规律性网状传播。

3.1.2. 西南“茶马古道”上语言接触研究

“茶马古道”是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和邻国进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1990年,木霁弘、陈保亚等六人走访了马帮路线,并于次年以笔名在《云南大学学报》发表《超越——茶马古道考察记》,在这篇文章里使用了“茶马古道”。这条道上民族众多,聚居杂居在一起,连接了汉、藏、羌、彝、白、纳西、傣、苗等几十个民族,汇集了各族文化;语言包括汉藏语系低下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等几十种,相互交融,呈现独特性。这里主要概述“茶马古道”川滇地区的相关接触研究。

以陈保亚为代表的傣汉接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他的著作《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1996)中研究了德宏汉族和傣族语言相互接触过程中所产生的现象和问题,不被传统理论所束缚,总结出了如匹配、回归、并合、母语转换等一系列新的理论与方法,为后人的语言接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少数民族的语言研究有重要贡献。《从语言接触看历史比较语言学》(陈保亚,2006)一文,打破了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思维,注意到语言间的相互接触对语言演变所起的重大作用。

汪锋(2012)根据语言(白语、彝语)各方言的古音构拟,在词源分阶的基础上提出“不可释原则”,探究语言(方言)之间接触的深度及是否是同源关系。《汉藏语言比较的方法与实践——汉、白、彝比较研究》(2013)主要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追根语言源流,探究汉藏语的比较方法:(1)重构形式的分级;(2)系统匹配与层次对应;(3)词汇的同质性和层次校准;(4)词阶法的检验与延伸(不可释原则);(5)语言亲缘分类的特征法与词源统计法。得出汉、白、彝之间的关系为:((原始白语,上古汉语)原始彝语),“白语很有可能是汉语受彝语强烈影响而形成的汉语方言”[5]“白语和汉语在语源上有更直接的亲属关系”[5]。汪锋的研究为汉语和藏缅语同源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另外《从汉藏语言比较看茶马古道的演化——以汉、白、彝语比较为基础》(2016)一文中他还通过语言比较,澄清*la“茶”类词的起源与传播模式,即*la“茶”起源于藏缅语的*s-la“叶子”>“茶”,从彝语传播到傣语,再经由傣语传播到部分孟-高棉语(如布朗语、佤语)。汪锋指出历史语言学中的普遍词义演变模式为词语的语音对应提供了比较的语义基础,并为内部演变的时间先后和方向提供了依据。杨立权《语言接触与原始白语的历史层次》(2007)以理清白语的历史层次为前提,“三重证据法”为参照,通过白语方言、亲属语、接触语的比较,

分析出现代白语中沉淀的三个时间因子：同源、自源、异源，呈现白语演变过程的三个阶段，来探求白语发生学归属。

以上主要从历时语言学的角度探究同源解释和接触解释问题，特提出了相关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基于语言(语音)变化发展的脉络，从纵向重点考证语言的发展演变过程。

陈保亚(2020, 2023)提出语言接触和扩散“线性说”，根据“茶马古道”上西南官话传播的情况得出，古道附近的少数民族基本会说西南官话。“语言的线性传播是语言横向传播的基本方式，地理语言学中的波浪理论(19世纪，Schuchardt 和 Schmidt 先后提出了语言传播的波浪说理论(wave theory)只是语言横向传播的特例。”[6]汪锋、李焯等的《白语方言发生的变异与演化》(2022)运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白语方言中发生变异，关注到语言接触的影响下，语音发生变异与社会因素的关联。

此外，戴庆厦先生在民族语言接触研究上也是硕果累累，《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1992)中以实际案例分析汉语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对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也做了研究。并且对少数民族转用汉语也做了探讨。他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丛书”对西南哈尼族、景颇族、阿昌族、彝族、白族、布依族、拉祜族、傣族基若族等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以及语言接触问题都有一定的研究。袁焱《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阿昌语个案调查研究》(2001)一文，此文以阿昌语为对象，把语言接触引起的各种变化当作一个系统来研究，提出语言接触引发出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及语言转用等三种结果，这是语言接触导致的一种语言变化链，阿昌语的具体事实表明，这条链上的三种结果是连续的，存在因果关系。其他还有李锦芳也在其研究中总结归纳了中国西南地区双语类型及其历史转换。如在《双语和双语类型转换——西南地区个案研究》(2009)研究了《阿昌族双语类型的转换研究》张明仙、杨文华《罗平布依族当代语言演变动因——语言接触与语言兼用》(2006)、刘青《云南山区多民族杂居村落的语言接触》(2012)、杨立权《茶马古道语言研究》(2020)、李云兵等。

陈保亚、戴庆厦、汪锋等人的研究标志着从感性描述转向算法精准化。通过“词源分阶”与“不可释原则”，将语言接触从同源关系中剥离，实现了从“像不像”到“为什么像”的解释力跨越。

3.1.3. 其他地区语言接触研究

国内其他语言接触研究较多的还是围绕新疆、内蒙古地区、广西为主的地区。新疆、内蒙古地区也是多民族聚居区，是阿尔泰语系下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的多种语言汇集地带。广西为主地区主要是壮侗语族语言较多，壮语和汉语、其他民族语的研究也较多。罗美珍、邓卫荣(1988)以侗泰语、汉语为参照，对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内的五色话从语音、词汇、语法进行了对比研究。曾晓渝(2003)论述了汉语侗台语声调的历史发展，对壮傣、侗水语里的汉语老借词调类对应一致现象作出解释，并讨论侗台语汉语接触及语源问题。王福堂(2005)主要探讨汉语方言对壮侗语声母产生影响，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是壮侗语和汉语声母相接触的历史阶段不同。韦琍(2008)全面考察了壮语对广西境内官话、平话、客家话、闽语、白话、湘语这些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影响，证明弱势语言对强势语同样有影响。

3.2. 汉外及方言接触：从偏误分析到变异动因研究

在以汉语为主的多民族语环境下，最明显的是汉语对民族语的影响，但反过来民族语和汉语、汉语各方言在交互使用的过程中，引发出各种带有地方、民族特点的汉语方言，呈现“普通话-方言-民族语”的接触层面。这也引起语言学家的关注，成果非常丰富。

3.2.1. 古汉语接触研究

历史上，政治动荡、战争频繁的时期，往往也伴随着经济重心移动，民族迁徙，这过程中语言接触也就不自然地产生了。先秦、魏晋南北朝、元代，因此民族融合和接触异常活跃。鹿钦佺(2014)通过历史

比较,从音韵、形式上论证“也”字判断句来源于上古时代的羌人语言,它不是汉语内部自发形成的,而是一种语言接触的现象。“元代白话”呈现出一种由语言接触而引起的独特面貌。语言接触研究多集中在这个时期的“蒙式汉语”“汉儿语言”,还有蒙汉翻译作品基础上的研究。在祖生利的研究中认为,“汉儿言语”具有“克里奥尔语”性质,林焘则认为,恐怕只有“洋泾浜”式的皮钦语性质。其他的,曹广顺、遇笑容(2010, 2014)通过对中古译经和元白话引起的语法变化进行研究,探讨了汉语史上因语言接触而带来的语法变化。夏筱轩(2009)从宏观上论述了元代蒙式汉语的特点。李泰洙(2000)对汉语方位词在各个版本的《老乞大》中的特殊功能进行了对比研究,证明了元代汉语中某些特殊的语法格式是受到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的影响。还有傅林(2013)利用契丹语文本和汉语相关文本对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

3.2.2. 语言接触与方言研究

汉语方言之间都有同源关系,汉语母语分化的结果就是各个方言。对于汉语方言之间的同源关系和方言形成的分化过程,方言研究者们向来非常关注,研究也很全面深入。语言在分化的同时也在融合,而语言的融合是通过接触而发生的,所以汉语方言接触也是方言研究的重要内容。王福堂、游汝杰、周振鹤、潘悟云、邢福义等在方言及接触研究上有很多建树。邢福义(2000)提出在“大三角”理论框架下,方言与普通话、古近代汉语鼎足三立来研究现代汉语语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陈保亚(2005)《语言接触导致汉语方言分化的两种方式》论述了民族语言在和汉语的接触中对汉语影响的两种方式,一是汉语民族方言通过母语干扰有规则有系统地影响汉语,导致方言的形成;二是汉语民族方言通过母语转换变成汉语方言。游汝杰(2016)谈到当前人口迁移和语言分化不再出现新增语言或方言,而由语言接触造成了新的混合语,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边界型、移民型、克里奥尔型和柯内因型。并提出语言接触不仅是语言微观演变的重要动因,也是语言宏观演变的重要动因[7]。

近些年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探究各方言的变异研究越来越多,探究集中在苏-沪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还有官话区中的兰银官话等。如刘丹青、盛益民对吴语等方言的研究,从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出发,探讨方言之间关系,注重对语言动因和机制的综合考察。陈忠敏、陶寰等研究上海话受普通话影响产生的语音变化。石定栩、邓思颖等主要立足粤语与在与汉语普通话、沿海各方言接触、英语等影响下,探究语言使用的特点及发生的变异。吕军伟“语言接触视野下的广西‘南普’变异研究”东南汉语方言在民族语、汉语普通话接触中产生的变异等。硕博论文中探究方言接触也较多,如闫莎莎(2020)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探究陕南柞水话的语音变异,并分析了引起语言接触变异的各种因素在变异中的作用及影响程度。

3.2.3. 汉外语接触研究

汉语和外语接触研究中,多从二语习得的角度出发,对语言教学中迁移影响调查研究较多。以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为研究对象,而针对亚洲地区的汉语语音的研究主要以日本、韩国、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学习者为主。从调查教学经验、数据量化的实证分析研究汉外接触中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的学习偏误。通过双语接触过程中的影响机制的探究解决语言学习当中发生的负面迁移,促进教学;另外,有徐大明对新加坡话语的变异研究;包智明对新加坡英语的研究,还有徐大明、包智明、陈玉珊等的研究。还有俄汉、蒙汉等也有较多成果。

此外,汉外接触研究中较早涉及的是“借词”的问题。较早的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950: 18)就提出“借字”;高名凯1958年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讲到外来词是普通语言学的重要问题之一,并提出不同语言接触中“底层”的概念。史有为在《汉语外来词》(2000)提出“外来词”某种意义上可同“借词”。胡兆云的专著《语言接触与英语借词研究》(2001),对汉语和英语的接触进行了研究,其中重

点放在了英语对汉语词汇方面的影响。方欣欣(2008)的《语言接触三段两合论》中提出语言接触和词语借用的“三段两合”理论,从语言接触的研究视角下,把借词的研究分成不同的阶段来讨论。把语言接触作为一个大框架,从时间和阶段进行讨论,借词的研究从借入前到借入后把整个词语借入的过程细化,以一种动态的、分时分段的角度来探讨借词。

当前,也有研究外语翻译下语言间接接触。陈保亚称之为非自然接触:“在不同的空间通过文字传播或文献翻译展开的。”[8]传统二语习得研究正转向社会语言学视角的“非自然接触”(翻译引发的接触)研究,探讨书面语对汉语语法的潜在影响。

4. 本土化理论框架的构建路径研究

在长期吸收西方经典接触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学界愈发意识到,基于海外移民背景产生的皮钦语/克里奥尔语模型,难以全盘解释中国境内长达数千年的“慢性、共生”型接触事实。因此,构建具有本土解释力的理论话语体系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驱动力。国内学者在西方的理论基础和中国语言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并提出了许多综合语音、词汇、语法且适合中国语言接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4.1. “本土化”的内涵界定

“本土化”并非闭门造车,其核心在于修正西方基于“突发性移民接触”所构建的皮钦/克里奥尔语理论偏差。针对中国境内汉藏、阿尔泰等语系长达数千年的“缓慢性接触”特质,本土化内涵界定为:在稳定的地理与社会共生关系下,语言如何通过高频度重叠实现深层结构的“型变”而非简单的词汇借用。它强调构建“普通话-方言-民族语”的三级接触架构,解析从“孤立语”向“粘着语”特征渗透的机制。这种界定使研究视野从表层现象记录转向对中国特有地缘语言演化规律的深层阐释。

4.2. 国内已有的本土化研究理论

国内学者在长期扎根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复杂的语言接触事实,已初步构建起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工具,实现了从“借用西方理论”到“提炼本土规律”的跨越。

4.2.1. 语法复制与型变理论

吴福祥将西方“语法复制”概念与中国南方民族语(如壮侗语、南亚语)的演变实践相结合,系统解释了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化机制。该理论成功论证了语序重组并非随机的结构干扰,而是受语(复制语)仿照模式语的语法模式进行重新分析的结果。

吴福祥在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的机制上提出很多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2007)基于 Thomason 的研究框架,综述与接触引发的演变,并对接触引发的演变可能给受语系统带来的后果、演变类型、演变机制,以及预测接触性演变的程度和种类等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等,让我们对 Thomason 的观点有了更正确的认识。在多篇文章(2008, 2009)中结合语言接触理论和语言类型学讨论“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构建少数民族语言演变过程中接触引发演变机制过程:“语序重组”(语法复制),也涉及“语法借用”。并进一步说明(2014)语法结构复制的两种机制:结构重组和构式拷贝。并在 2016《民族语文》上的文章结合大量的语料和实例重点谈论了“语法复制”“型变”“语言区域”三个概念及相互关系,“语法复制是指一种语言(复制语)仿照另一语言(模式语)的某种语法模式,产生出一种新的语法结构或语法概念;它是接触引发的语法和语义演变的重要机制。型变是指一个语言的语法系统受另一语言的影响而发生整体性重组,以致在结构类型上发生根本性改变;它是语法复制的后果或产物。语言区域的重要特征是一个地理区域的不同语言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相似性;而其原因和动力是包括语法复制在内的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指出“语法复制”作为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的重要机制,是形成“型变”和

“语言区域”的重要过程。在《语法接触与语法演变》(2020)一文中又进一步说明语法复制并非必然以复制语存在相关结构或使用模式作为基础和前提,它也可以无中生有地复制模式语的特定结构。在《也谈语法化的机制和动因》(2021)中谈到语法化有五个基本的机制,即“隐喻”“转喻”“重新分析”“类推”和“语法复制”(grammatical replication)。再次强调语言接触引发语法复制,是语言演变的外部动因,语法复制是语法化的外部机制。吴福祥的理论不仅阐明了南方语言中“修饰语后置”等特定语序互动的深层逻辑,更提出了“型变”这一核心概念,即语言受接触影响发生的整体性重组。这一理论突破了“语法结构是封闭系统”的传统认知,为判定语言区域(Linguistic Area)提供了关键的机制解释。

还有不少学者,基于语言接触理论和类型学框架,从语法化视角研究我国南方民族语言受汉语影响而发生的若干语序演变或变异现象,进而揭示语言接触与语法演变之间的关系。李云兵在对中国南方地区的一些民族语言(主要是汉藏语系语言、南亚语系语言和南岛语系语言)的语序调查之后,得出“目的语影响母语形成的变异状态,相对稳定,随着影响的深入和加强,受影响的母语不能回归,变异状态也不会消失,发生变异的母语会成为一种方言或土语,在语言的本体上通常表现为语法手段、语法范畴、语义范畴、句法结构类型的借用或渗透或重新分析,语用规则发生改变,语言系统出现变化,甚至出现语言混合。”其他,戴庆夏(2005)、杨永龙(2019)、王双成(2020)、敏春芳(2023)等也有相关研究[9]。

4.2.2. 词源分阶与层次分析

在汉藏语系等同源关系与接触关系高度交织的地区,如何剔除接触干扰以判定亲缘关系一直是国际难题。陈保亚、汪锋、李子鹤等通过对“茶马古道”等区域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词源分阶”、“不可释原则”、“共享创新和词源统计法”。

以上理论通过对借词层次的剥离,原始语的构拟解决了接触干扰严重的地区(如:傣语与汉语;白语、彝语与汉语;纳西语、彝语与嘉绒语的关系)中,亲属词与借词混杂的鉴定困境。层次分析法将语言演化看作一个动态的、多深度的叠加过程,使历史比较语言学在面对大规模语言接触事实时,具备了更为严密的逻辑推导和算法支撑。

4.2.3. 语言接触“三段两合论”

针对借词研究长期存在的静态描述倾向,方欣欣(2008)提出了“三段两合”理论,将语言接触过程划分为接触前、接触中、接触后三个阶段,并重点考察借入语与吸收语的“合”机制。

该理论提供了一个具有时间维度的本土模型。它不仅关注借词的形态转换,更关注借入语在进入目标语系统后,如何经历从“异质成分”到“有机组成部分”的整合逻辑。这一框架为动态、过程化的借词研究提供了标准化的分析路径,弥补了以往研究对接触过程性关注的不足。

5. 语言接触研究特点和研究展望

尽管国内语言接触研究已在理论构建与事实描写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全球化语境、多重接触模型以及前沿技术融合等方面仍存在广阔的探索空间。站在学科发展的新起点上,未来的研究亟需突破“单一对立”的观察视角,向更深层次的语义逻辑、更复杂的多语竞争环境以及更精密的科技支撑手段迈进。

5.1. 语言接触研究的现状特点

陈保亚(2016)指出语言接触研究对探究语言演化机制,重建完整的历史语言学理论模型,回答人类起源、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在展开语言接触的追踪调查和分析上广泛深入探究语言接触机制。但目前很多语言接触参数没有说清楚比如:单双音间接接触有何不同?同语序之间的接触,不同语序之间的接触,这些不同的接触类型有什么区别?通过双语展开的自然接触

和通过文本展开的非自然接触在接触机制上有什么不同的规律？在自然接触中，只有单方民族是双语者和双方民族都是双语者，接触机制有什么区别？区域的连续接触和语言岛的接触有什么区别[10]？这些问题在当前能看到的语言接触成果中研究都还不是很充分，总结起来语言接触研究现状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双语研究较多，研究焦点集中在汉语对民族语言的影响。这部分研究成果在语音、词汇、语法都有所涉及，但针对语言演变的系统性研究不够充分，影响机制还可进一步深入。

第二、民族语对汉语的渗透、影响研究范围不广。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影响是显性的，对语言使用、规范、规划等有更突显的效益，也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弱势语言对强势语言影响往往是隐性的、缓慢的，且有多民族杂居、接触时间久等条件的影响，所以往往被忽略，研究范围不广。

第三、语言接触中关于语义、语用研究不突出。语言接触研究中多从本体出发，探究语音、词汇、语法等的借用、借贷、语法复制等，在语义变异、语码转换、语用方面研究还不是很很多。

第四、语言接触研究中关于我国语言现状的“系统性研究理论和框架”不太多。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约有130种语言，语言资源非常丰富，接触形态也多样，如能有一套“量身打造”的接触研究理论，必定促进我们多语言研究。

第五、三语及以上接触研究较少。三语接触研究比双语研究更复杂，语言演变机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存在着多种可能，对语言接触研究无论是在理论基础还是方法上有更大的挑战性。

5.2. 语言接触研究展望

我国有着丰富语言资源，有许多研究语言接触的珍贵的多语地带。关于不同系属的语言之间、同一系属的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接触现象还有许多待发掘和研究的空间，语言接触的理论和机制也待进一步完善。

5.2.1. 从“双语”向“多语/三语”接触发展

中国境内复杂的人文地理环境决定了语言接触往往是“多方参与”的复合过程。目前的一对一双语模型已不足以解释真实的演化逻辑。重点关注多重接触的重叠接触影响，可开发针对“多对一”或“多对多”接触效应的分析工具。例如，在西南或西北地区，一种少数民族弱势语言往往同时受到“汉语普通话”(强力行政语)和“汉语方言”(强势生活语)的双重挤压；或者一种民族语受到其他民族语(区域优势语)和汉语(强力行政语)的影响，进而发生的变化等。此外，需重点考察在多重语言场域中，受语如何选择性地吸收不同来源的成分，以及这种竞争如何导致语言系统出现非线性的突变。这种“竞争性演变”的研究将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语言的多样性保护提供核心理论支持。

5.2.2. 关注语义与语用的“精细化”考察

未来的语言接触研究应实现从“孤立特征描述”向“系统功能分析”的范式转移，核心在于从静态的词汇借用转向动态的语义、语用演变机制考察。研究不应仅关注单一借词，而应考察接触如何引发母语内部整套语义逻辑的“坍塌与重建”。以亲属称谓系统或颜色词系统为例，当外来语言的分类范式进入后，母语原有的语义边界会发生位移或合并。这种重组揭示了接触不仅是符号的交换，更是认知分类体系的重塑。

还可引入实验语言学手段，如利用眼动实验观察多语者在处理混合语料时的认知负荷，或通过语料库定量分析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在不同社会场景下的分布特征。通过测算多语者在特定语境下切换语言的“心理阈值”，可以更科学地揭示社会认同、交际策略对语言接触结果的微观动因。

5.2.3.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语言接触研究天然具有交叉学科属性，未来的突破点在于将传统语言学方法与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实

质性”而非“装饰性”的整合。例如：利用 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将语言变异点的空间分布与古代商路(如茶马古道、丝绸之路)、民族迁徙路线、甚至古地理气候数据进行精确叠合。通过空间建模，可以直观地还原语言扩散的物理路径，使“语言区域”的判定由主观推断转为空间数据的实证分析。还可结合遗传学方法，深度结合 Y 染色体、线粒体 DNA 等分子遗传学证据，通过计算人群迁徙与基因流动的规律来验证语言联盟的形成机制。当语言演变树与基因演化树实现耦合时，我们方能真正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语言接触的历史真相。

中国语言接触研究正处于从“现象发现”向“理论爆发”转变的前夜。中国丰富的多语事实、长达千年的慢性接触史，为全球语言接触学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验室。未来的学术任务，是跳出单纯“事实描写”的舒适区，通过本土化理论的系统构建与跨学科手段的深度融合，建立起具备解释力的动力学模型。这不仅是对中国语言事实的科学交代，更是要在世界学术舞台上贡献具有中国标识度的语言接触学范式。

参考文献

- [1] 罗仁地. 以人中心: 交叉研究的必然走向[J]. 语言战略研究, 2023, 8(3): 93-96.
- [2] 张兴权. 接触语言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3] 田贵森, 孙建民. 语言变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5(3): 99-103.
- [4] 杨永龙. 导语: 语言接触与甘青河湟语言区域特征[J]. 当代语言学, 2022, 24(6): 791-795.
- [5] 汪锋. 汉藏语言比较的方法与实践——汉、白、彝比较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6] 陈保亚, 覃俊珺. 茶马古道上通语的线性传播模式——以晋语文白异读为例[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 146-155.
- [7] 游汝杰. 语言接触与新语言的诞生[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8(1): 88-95+171.
- [8] 陈保亚. 语言联盟与语言接触[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6.
- [9] 李云兵. 语言接触对南方一些民族语言语序的影响[J]. 民族语文, 2008(5): 17-34.
- [10] 陈保亚. 语言接触研究对认识语言演化规律的迫切性[J]. 汉藏语学报, 2016(00): 172-176.